

《難說再見》



近日，沉浸版芭蕾《難說再見》在上海音樂廳上演。這是芭蕾《難說再見》首次走下舞台，以沉浸式的方式進行表演。圖為芭蕾舞演員在深邃長廊翩翩起舞。

中新社



當盲盒遇見藝術



「讓藝術落地」是眾多藝文機構和藝術家關心的話題，不過，說易行難，博物館和畫廊等不斷嘗試拓展受眾，可真正讓人眼前一亮的產品並不算多。香港玩具有公司How2Work與內地潮玩公司泡泡瑪特（Pop Mart）聯乘開發的「精靈藝術家」盒玩吸引觀者的主要緣由，而如果潮玩公司有興趣在藝術普及和教育上做多一些事情，單有搞笑公仔或「cosplay名畫」之類的噱頭或許並不足夠。如果插畫家、潮玩玩具公司與博物館等藝文機構合作，因應藏品推出面向不同受眾（如青少年或親子家庭）的盒玩系列普及藝術史知識，並配合出版藝術史繪本以及製作音視頻節目等，盒玩或許不再僅僅限於「好玩」，而多了「傳播知識」的功能。當所謂的IP可以為公眾提供更多價值（例如社會關懷、族群建構以及知識普及等），潮玩的意義更凸顯，生命亦更久長。

「讓藝術落地」是眾多藝文機構和藝術家關心的話題，不過，說易行難，博物館和畫廊等不斷嘗試拓展受眾，可真正讓人眼前一亮的產品並不算多。香港玩具有公司How2Work與內地潮玩公司泡泡瑪特（Pop Mart）聯乘開發的「精靈藝術家」盒玩吸引觀者的主要緣由，而如果潮玩公司有興趣在藝術普及和教育上做多一些事情，單有搞笑公仔或「cosplay名畫」之類的噱頭或許並不足夠。如果插畫家、潮玩玩具公司與博物館等藝文機構合作，因應藏品推出面向不同受眾（如青少年或親子家庭）的盒玩系列普及藝術史知識，並配合出版藝術史繪本以及製作音視頻節目等，盒玩或許不再僅僅限於「好玩」，而多了「傳播知識」的功能。當所謂的IP可以為公眾提供更多價值（例如社會關懷、族群建構以及知識普及等），潮玩的意義更凸顯，生命亦更久長。

泡泡瑪特近日在港上市，引來不少人對於「盲盒」這個時興概念的關注。有人以日本「福袋」與「盲盒」類比，看重玩家抽取盲盒過程中因隨機與不確定帶來的快感（或也可能是焦灼），而我更關心盲盒從構思到生產再到營銷背後的IP經營。潮玩的個性與小眾文化圈層的聚合與維繫，是泡泡瑪特逆市上揚的關鍵，而「精靈藝術家」系列盒玩的醞釀與暢銷，即是例證。

「精靈藝術家」系列共有十二款公仔，每一款均「惡搞」或致敬一位著名藝術家或一件知名藝術品。從文藝復興名家米開朗基羅的傳世雕像《大衛》、達文西的《蒙娜麗莎》，到荷蘭美術黃金年代畫家維梅爾《戴珍珠耳環的少女》以及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里特的《人類之子》，香港知名插畫家龍家昇將玩具界人氣形象Labubu（一隻時常露出壞笑的精靈）扮成這些經典畫作與雕塑中的主角形象，因此，波提切利名作《春》中的維納斯變身半裸的精靈，羅丹名作《思想者》變成思考的精靈



▲「精靈藝術家」系列盒玩以名畫為靈感創作 Daisy攝



如是我見
天愛

展廳是一個裝飾簡潔的正方形房間，天花板上被切出了一塊矩形且幾乎沒有厚度的天窗，像畫框一樣勾勒着天空。在這裏，人們無法直接看到太陽降落，但是能清晰地感受到暮色四合。

東景緣由有着六百多年歷史的智珠寺改建而來。和很多北京的古建築一樣，智珠寺藏身在胡同深處，並且一度在時代變遷和風雨洗刷中被人們遺忘。十年前，東景緣團隊開始了對智珠寺的修復和改建工程，以「修舊如舊」的方式讓它重新煥發生機。經過精心修復後的

或許你們知道，或許你們不知道，在距離紫禁城只有幾步之遙的東景緣，有一個屬於落日愛好者的靜謐空間。二〇一三年，視覺藝術家James Turrell在這裏打造了名為Gathered Sky（落日時分觀賞）的永久裝置藝術展

建築群沒有艷麗的色彩和繁複的浮雕，它質樸的底色和歷史感幸運地得到了保留。遊人身在其中，便能在靜默中產生思古之幽情。或許是被寺廟裏的空靈和玄妙所打動，Turrell選擇在這座古建築裏嵌入他的藝術裝置。

東方繪畫線條上美，西方藝術家則更明確地追逐對光影的研究和刻畫。Turrell喜歡「光」本身的物質性，為了研究天光和空間的關係，他還曾買下了一座火山用於藝術創作。當談論到「光」的時候，Turrell說他總思考人們如何看待「光」這件事情，如果將光與其他大自然的所生成之物相比（例如黃金），後者需要人類雕琢方能凸顯本質的美。光也是如此，儘管無處不在，卻需要經過不斷的開發和探索，才能呈現它的美好。在東景緣的展覽中，天空不再遙遠，因為它變成了天花板的一部分；天光也不再縹渺，它化為有質感的顏料，填充在原本空蕩蕩的房間裏。

天空、天光和落日景象，它們聽上去十分日常，卻總能激發人探究的欲望。當我面對

販賣日落

黃昏裏的天空和城市時，時常覺得自己只能靜靜地凝視和欣賞，此外無事可做。很多時候，美麗的事物激起的滿足感很難被保持，重複性出現會讓人感到厭倦，日落的場景雖然每日都會出現，但它是不斷變化且難以捕捉的。它既不是博物館裏的固定展覽，也不是城市裏永久矗立的建築，它的美讓人感激大自然對人間日復一日的饋贈。

曾經的我反覆思考着「生活和繁衍的意義」。我一度說服自己相信人活着這件事本身沒有什麼意義，但是接受無意義的生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。隨後我用美來說服自己，如果能源源不斷地產生藝術家，那麼人類世代相傳便有了意義；如果我們還能為美麗的事物心動和感動，那生活就也有了意義。有時我們只需要付出一點努力，去衝破感官的局限，便能邂逅未知的美。

如果有一天，時間剛剛好，你可以走進一座靜謐的古寺，然後抬起頭，去欣賞一場純粹的日落。

冤家路窄



英倫江
漫話
恆

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在著名喜劇《無事生非》（Much Ado About Nothing）中，描繪了一對歡喜冤家

，他們彼此看不上對方，互相冷嘲熱諷，但最終卻結為連理，這個劇情大可以放在英國和法國身上，只是雙方的苦澀多過甜蜜。

上周英國與歐盟領導人會晤試圖挽救脫歐談判時，首相約翰遜就被法國人當眾弄得下不來台。他當時見到歐盟首席談判代表巴尼耶，原本想搞個小幽默，用今年初巴尼耶前腳離開唐寧街十號、約翰遜後腳就感染新冠肺炎的事來套近乎，指着對方說「是你讓我中了招」，不料巴尼耶嚴肅地回敬了一句「不，是你傳染給我的」，據說現場的氣氛好像結了冰。

這個不懂幽默的巴尼耶正是法國人，由於他一直立場強硬，被很多英國人認為是法國故意從中刁難，也因此成為「眼中釘」。歐盟的消息指，法國總統馬克龍作為歐盟一個關鍵話事人，貿易協議談不談得成，要看他臉色，比如捕魚權，就是法國不肯點頭，所以說談判很大程度上就是英法兩家在較勁。

這種較勁甚至上了飯桌，歐盟在招待約翰遜「最後的晚餐」時，就按法國人的意思特意安排了一道前菜扇貝，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潛台詞——勿忘英法「扇貝大戰」。二〇一八年，英法兩國漁民曾為搶奪打撈扇貝，在英吉利海峽靠近法國諾曼第附近的水域展開過海上激戰，四十艘法國漁船「圍毆」五艘英國漁船，這場實為爭奪漁業捕撈權的較量，最終以英國漁船寡不敵眾、撤離該海域收場。法國人處處使絆子，讓約翰遜這頓飯吃得很不愉快。

其實脫歐談判只是英法這對老冤家互別苗頭的一個縮影，如果追溯歷史，自從一〇六六年來自法國的威廉一世征服英格蘭後，英法實際上就結下了世仇，到後來金雀花王朝開始的百年戰爭，以及拿破崙時期的第二次百年戰爭，兩國的矛盾越積越深，直至近現代，不論從殖民擴張，還是列強稱霸，雙方雖偶有合作，但競爭如影隨形，如今英法都是歐洲大國和全球重要經濟體，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，都擁有核武器，都自



◀電影《黑暗對峙》中，邱吉爾用手比「V」字表示勝利

劇照

影響力不相上下，甚至在分量上有可能壓對方一頭。

我在英國的這些年，也常聽到英國人和法國人互相吐槽。有一個頗經典的段子，是說兩個英國人在對話：「全球變暖對我們英國有好處嗎？」「如果海平面上升，我們就能離法國遠一些了。」這個笑話將英法互相嫌棄，卻又不得不做鄰居的矛盾心裏刻畫得淋漓盡致。

有一位經常往來於法國的英國朋友，曾向我傳授和法國人打交道的經驗。他說，歷史上英國遭威廉一世征服後，上層貴族都講法語，而講英語被視為下等人，因此法國人存在一種天然的語言優越感，平時不屑講英語。讓法國人講英語的正確打開方式是：不能直接問對方「你會講英語嗎？」他通常不會搭理你，但若換個方式問，「你會講中文嗎？」他馬上會用英語說「我不會中文，但我會講英語。」這其中當然有很大的戲說成分，但無疑形象地反映了英法這種幾乎融入到基因的冤家對立。

英法兩國長期的恩怨情仇，不僅表現在口舌之爭，也體現在生活的點點滴滴之中。比如，倫敦市中心著名的交通樞紐滑鐵盧車站（Waterloo Station），就取名於鄰近的滑鐵盧橋，顧名思義，此橋是為紀念一八一五年英法之間滑鐵盧戰役，當時以英國為首的聯軍大敗法蘭西帝國的拿破崙。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滑鐵盧車站當選為「歐洲之星」列車服務的英國總站後，法國頓時心生不滿，認為這將勾起法國人不愉快的回憶，曾專門致函英國政府要求車站更名。

再比如，廣為熟知的倫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廣場，也是為紀念英國打敗法國和西班牙

聯合艦隊的特拉法加海戰而修建，而廣場中央矗立的高大紀念碑，頂端的銅像就是指揮海戰的英國海軍名將納爾遜，正是他當年率領英軍，實現以少勝多，但最終不幸被流彈擊中而犧牲。據說紀念碑底座上的四座青銅浮雕，就是由繳獲的法國槍械融化雕刻而成，內容也是講述這位英國民族英雄的豐功偉績。

如果大家還記得描寫戰時首相邱吉爾的電影《黑暗對峙》，裏面也提到一個與法國人有關的典故。劇中邱吉爾最初用手比「V」字表示勝利，但手背向外，秘書提醒他，該手勢代表「見鬼去」的意思，手心向外才表示勝利。

而這個手背向外的「V」字手勢，就來自於英法百年戰爭期間，法國人吃盡英國人長弓的苦頭，抓到俘虜後就一律剝掉食指和中指，讓其無法再拉弓射箭，於是英國士兵見到法國人，就會高高豎起這兩根指頭，大有羞辱和嘲弄對方的意思，直到今天這個手勢在英格蘭地區仍廣泛應用。

對於英法兩國人民為何彼此存在偏見，一位法國人曾告訴我，在他們眼中，英國就從未真正熱愛過法國，普遍老百姓只沉迷巴黎的時裝和戲劇，享受美食和購置海濱房產，政客們則大玩「離岸平衡」和「光榮孤立」，就像英劇《首相大人》（Yes Prime Minister）裏內閣首席秘書的精妙總結：英國的外交目標五百年未變過，就是製造一個分裂的歐洲。

英國人可能也這麼看，莎士比亞在《亨利六世》中寫道：「只能利用法國，不能信賴法國」，這和邱吉爾口中「沒有永遠的朋友，只有永遠的利益」不謀而合。

北京時間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十點五十分，作家劉荒田發來一篇紐約文友轉帖說：「我的叔叔胡思升今晚八點二十分離開了我們……昨天，我在醫院見了他最後一面……」這是思升的侄女發的帖。我不禁悲咽無聲……

我與胡思升相識相交已經整整六十年。那時，我剛入《人民日報》，他則正任《人民日報》駐匈牙利記者，當時，兩大陣營雄峙東西兩個世界，「匈牙利事件」點燃了全球媒體，《人民日報》上幾乎天天有「本報記者胡思升布達佩斯報道」。那是個批判、消解個人名利主義的時代，幾乎大多數新聞報道都不署名，唯獨他是例外，於是聲名大振，首都新聞界幾乎無人不知他是個少年得志者。此言不虛，他一九四九年畢業於華東新聞學院，之後即入《人民日報》，十八歲被派駐蘇記者，「匈牙利事件」爆發後乘坐蘇軍坦克入布達佩斯採訪及長駐，事件平息後又派駐波蘭記者多年，歸國後，任國際部編輯，不少國際問題觀察和述評出自他手，

直到離開報社。

那時，《人民日報》社還設在王府井大街，我上夜班，宿舍就在離報社不遠的校尉營胡同內一個有兩層小樓的院子裏。六十年代初的一個夏天某日，我中午起床開門，正要去洗漱間，卻見一男子正赤膊短褲在院中運動，後來得知，他就是新聞界少年得志者胡思升。他長我五歲，或許因為性情興趣相投，又住在同一院中，他不計資歷和地位，不久，我們就成了相投相得的朋友，始終話題不斷，談文學，談人生，談愛情……特別是夏季，我們往往下了夜班，騎車直奔什剎海，趁夜深人靜，游泳盡興後再回宿舍睡覺。到了周末，又常常騎車到頤和園在昆明湖中盡興。也不盡是玩和談，我們還同做文學夢。

一九六六年六月初，我被調至內蒙古杭錦後旗。六月三日上午，北京站陰雨綿綿，我同父母、小妹告別後剛登上火車踏板，思升兄匆匆趕來，他安慰我說去內蒙或許是好事。此時，列車已啟動，他跟着車跑了幾步，急

遞我一張紙條說：上車再看，這就是我要說的話……車速快起來，我急忙舉起手向越來越遠的父母、小妹和思升揮別。我打開紙條細看時，卻是他抄錄的王勃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川》：城闕輔三秦，風煙望五津。與君離別意，同是宦遊人。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。無為在歧路，兒女共沾巾。看着王勃這首情真意長又無奈的五律，想着他剛才的神情話語，我不禁眼淚潤濕、喉頭堵咽……我在內蒙一待九年多，從劇團編劇到《巴彥淖爾報》編副刊，我們從來通信不斷，每年回京省親，更有「相見時難別亦難」之感。

輾轉十三年後，我重回北京，入中國青年出版社做文學編輯和編輯室主任，他已成《人民日報》國際部國際問題觀察和評論的主筆。堅守本職工作之餘，他與朋友合作，先後參與創辦了《報告文學》和《海外港台文摘》兩大刊物。他還身體力行，寫了大量文情並茂，遍及政界、學界特別是文藝界的報告文學。有人說他所以能那麼快捷準確地採寫名人並造成轟動效應，是因為他扛着一塊《人民日報》的金字招牌，和他天生的風度與口才，這自然不能不算一個有利條件，但我以為，他開闊的眼界、胸襟和學養，多年記者生涯練就的敏慧和分析，採訪前對採寫對象的充分研究和背景材料的掌握，這才是他優於別人的魅力和優勢。

歲月匆匆，世事變遷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我們同是因為家庭原因，相繼移居美國，可惜，他在紐約，我在三藩市。雖常通電話，但大不如在北京時想見面隨時可見。新世紀初的某年某月，我飛到紐約，看視久別的思升和其他朋友，見他仍是那樣挺拔瀟灑，我不禁兩眼喜淚……在他位於皇后區的老年公寓裏，我們又重溫了幾十年來習慣的不歇長談，之後，他又約請紐約的王鼎鈞等作家朋友在一間中餐館敘事，新朋舊友，異國他鄉，杯酒下肚，大家談的仍是故國故人祖先文化，其情其景，暢快又淒然，沒想到，這竟是我和他的最後一面……

悠悠六十年的相識相知，未能送他最後一程，怎能不讓人悲懷長吟……